

人境廬詩與黃遵憲的仕宦網絡

蔣英豪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黃遵憲(1848–1905)的人生目標是當大政治家，可惜未能達成心願，戊戌政變(1898)後放歸故里，不得已以詩人終其生，¹ 留給後世的是深受重視的《人境廬詩草》，² 而其詩藝則為近百年來詩論家所賞識，其成就也為文學史家所肯定。人境廬詩的政治傾向是很強烈的，這是黃遵憲詩風格以至晚清詩歌特色的構成因素。黃遵憲自覺地以詩歌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我們從人境廬詩中可以很清楚看到他政治活動的圈子，以及他亟欲建立的政治關係網。而晚清政治生態環境中甚為突出的大吏幕府，在人境廬詩中也有很明確的反映。以人境廬詩與政治的互動作為討論的切入點，不單有助於了解黃氏的創作動機，也可以為晚清詩歌與政治的關係提供一個具體生動

¹ 黃遵憲〈支離〉(作於1898年)云：「窮途竟何世，餘事且詩人。」見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773。康有為(1858–1927)序《人境廬詩草》(1908年作)和梁啟超跋《人境廬詩草》(1897年作)，都提到黃遵憲政治家與詩人二重身分的矛盾與統一。康氏〈人境廬詩草序〉見《人境廬詩草箋注》書前，又參鄭子瑜：〈跋康有為黃公度詩集序手稿〉，載鄭子瑜：《詩論與詩紀》(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頁130–33；梁氏〈人境廬詩草跋〉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086。

² 《人境廬詩草》收詩226題，共641首；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編《人境廬集外詩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收詩77題，共284首。本文所說的「人境廬詩」泛指黃遵憲的詩作。1999年8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邀約專家學者評選「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目錄」，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是唯一入選的舊詩集，且以全票入選。參尚曉嵐：〈中國文學評出「百年百優」〉，《北京青年報》，1999年8月17日，第7版。

的實例。本文一方面著眼於黃氏如何以詩歌建立與維持他的仕宦網絡，另一方面則以入境廬詩所見的材料重現黃氏的仕宦網絡。

黃遵憲早具從政的志向與才能，他對如何走進政治的權力核心有很清楚的認知，也知道如何利用一己所長的詩歌作為政治的敲門磚與建立關係網的工具。結合他的行事與詩歌創作來看，可以知道他一直用心去接近三個權力中心：李鴻章(1823-1901)、張之洞(1837-1909)與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李、張二人是進士出身的封疆大吏，辦洋務皆有成績，望重權大，在地方和朝廷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是黃遵憲實現政治目標不能不接觸的人物。他們都各自有一個人才鼎盛的超級幕府。李、張這兩個超級幕府的幕主和幕賓，是入境廬詩中頻頻現身的人物，入境廬詩處處展示了黃遵憲努力於建立與他們聯繫的關係網絡。

二

黃遵憲與李鴻章的關係，始於他與何如璋(1838-1891)及張蔭桓(1837-1900)二人之過從。何是黃遵憲之父黃鴻藻(1829-1892)的客籍同鄉朋友，究心當世之務，為李鴻章所賞識。1875年得李鴻章等推薦，獲總理衙門保舉為「使才」。³ 1876年，清廷派他任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1874年在北京應廷試時與何如璋相識。1876年黃遵憲隨父到煙臺，時張蔭桓初接任登萊青道，黃遵憲因其父的關係得識張氏。值李鴻章在煙臺處理馬嘉里案結案談判，張蔭桓襄助李鴻章談判，深獲李氏賞識。⁴ 黃遵憲因張蔭桓得以初謁李鴻章。當時黃遵憲年二十八，尚未中舉，李鴻章卻頗嘉許他，稱為「霸才」。⁵ 黃遵憲雖未能憑這次見面入李氏之幕，但卻由此建立了與李氏及其幕府歷時二十多年的密切關係。何如璋任出使日本大臣，即延攬黃遵憲入使團，任職參贊，使黃遵憲得以開展他一生的外交事業，也使他有機會以在日的見聞及搜羅所得的資

³ 見溫廷敬：〈清詹事府少詹何公傳〉，載溫廷敬(輯)：《茶陽三家文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頁8。

⁴ 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

⁵ 黃遵憲〈李肅毅侯挽詩四首〉(1901年作)其四「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難」句自注云：「光緒丙子〔1876〕，余初謁公，公語鄭玉軒〔鄭藻如，1827-1894〕星使，許以霸才。」見《入境廬詩草箋注》，頁1064。按：在黃氏自己編次選定的《入境廬詩草》中，〈李肅毅侯挽詩〉是末篇，而「霸才」句為末篇的最後一句，這樣安排顯然有特殊用意。黃氏蓋以此總結自己的一生，也總結了他對當時時局的看法，也因此為《入境廬詩草》加添了悲涼的味道。今本《入境廬詩草》在〈李肅毅侯挽詩〉之後尚錄有〈寄陳氏靖廬〉及〈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二題，乃黃氏從弟黃遵庚(1881-?)所加。參錢仲聯：《夢苕庵詩話》(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頁162。

料，先後撰成影響深遠的《日本雜事詩》及《日本國志》。⁶ 當時與李鴻章關係密切的陳蘭彬(1816-1894)獲派為出使美日秘大臣，也曾邀黃遵憲同行，但黃遵憲終於從何而捨陳。⁷

在《人境廬詩草》中，黃遵憲為他1876年在煙臺與李鴻章之會留下了兩筆詩的紀錄，一是作於1876年的〈大獄四首〉，⁸ 一是作於1901年的〈李肅毅侯挽詩四首〉。〈大獄四首〉寫李鴻章在煙臺與英國談判馬嘉理案，以及李鴻章一生中負責簽訂的第一個屈辱條約《煙臺條約》。這首詩值得注意的是黃氏對馬嘉理案的看法，這也許就是黃遵憲當時與李鴻章見面時談話的內容。黃遵憲反對在國勢積弱之時輕啟外釁，在第一首中他說：「事竟成狙擊，危同捋虎鬚。陰謀圖一逞，攘外計何愚。」而在末首中他提出了國人應自我反省，腳踏實地處理對外關係。詩中並展示了他的大同思想：「休唱攘夷論，東西共一家。疏防司里館，謝罪使臣槎。詎我持英籟，容人擊副車。萬方今一概，莫自大中華。」⁹ 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達己達人的胸襟，的確是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所必不可缺的。這種精神與胸襟，也見於《人境廬詩草》其他詩篇。他贏得李鴻章的稱許，也許正由於此。

〈李肅毅侯挽詩四首〉總結了李鴻章一生的功過，揚功而不隱過，特別強調了李氏身繫一國之安危，以大才而無補於國勢飄搖之可悲。末首以廿五年前初會時李氏對黃氏的評許作結，「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難」，¹⁰ 既感李氏識己於寒微，也哀一己之終不能見用。

黃遵憲重視與李鴻章的關係，從《人境廬詩草》頻頻提到李氏可知。除了上述二題專詠李氏的詩，《詩草》中詠及李氏的尚有〈歲暮懷人詩〉(1890年作)之「天邊雄鎮北門管」、〈馬關紀事〉(1895年作)、〈書憤〉(1898年作)其二、〈述聞〉(1900年作)其五、〈七月二十一日外國聯軍入犯京師〉(1900年作)、〈聞駐蹕太原〉(1900年作)、〈四用前韻〉(1900年作)其二、〈六用前韻〉(1901年作)其一等多首。這固是由於李鴻章身繫國家興衰榮辱，而黃遵憲詩多詠時事，故屢屢及之；而黃遵憲基於個人關係特別重視李鴻章，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⁶ 《日本雜事詩》於1879年由總理衙門出版，《日本國志》則於1887年寫成，1890年付刊於廣州富文齋，至1895年始出版。二書的共同主題是「明治維新」，資料行文多雷同，《日本雜事詩》可說是《日本國志》的「韻文版」、「普及版」。

⁷ 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二〈黃公度先生年譜〉，頁1181。

⁸ 〈大獄四首〉，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2年)繫1876年作(頁518)；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則云「鈔本無此詩，蓋後來補作」(頁189)。

⁹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89，194。

¹⁰ 參注5。

《人境廬詩草》中的李鴻章可說是災星，每次他出現都連帶著中國的劫難，而隨之而來的不平等條約也一次比一次苛刻。如〈大獄四首〉記《煙臺條約》、〈馬關紀事〉記《馬關條約》、〈書憤〉其二記《中俄密約》、〈述聞〉其五、〈七月二十一日外國聯軍入犯京師〉、〈聞駐蹕太原〉及〈四用前韻〉其二、〈六用前韻〉其一記庚子事變及議和、〈李肅毅侯挽詩四首〉記《辛丑和約》等都是。如果說黃遵憲親手編定《人境廬詩草》，其選詩與編次有特殊用意，¹¹ 則黃氏在《詩草》存錄這一批有關李鴻章的詩，可能也有其微言大義。〈李肅毅侯挽詩〉末章也許有助於我們了解黃氏的微言大義：「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顏眼慣看。滿篋謗書疑帝制，一床踞坐罵儒冠。總無死士能酬報，每駁言官更耐彈。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難。」這詩雖在總結李鴻章一生的是非得失，裏面卻有黃遵憲最切身的感受與體會。求官者之奴顏婢膝，固是李鴻章之所常見，但黃遵憲並非如是；黃遵憲面對權貴，倨傲一如李鴻章。¹² 對才傑之士未能推心置腹，沒有人願意為他效死命，黃遵憲視此為李鴻章失敗之處；言外之意，是指李鴻章知己而不能用己。事實上1900年李鴻章在兩廣總督任上曾擬請黃遵憲出山，以設巡警開礦務之事委之，但黃遵憲曾經滄海，意興闌珊，堅決推辭了。¹³

黃遵憲與李鴻章有這樣深厚的淵源，主要是由於李鴻章掌外交大權，儼然「外交部長」，¹⁴ 黃遵憲一早就視他為一己開展外交、政治事業的門檻。為了維繫與李鴻章的關係，黃遵憲也致力於與李鴻章的幕客及跟他有密切關係的人建立關係，這在《人境廬詩草》中有頗全面的反映。首先是上述助黃遵憲建立與李鴻章關係的張蔭桓及助黃遵憲開展一生外交官事業的何如璋。張蔭桓對黃遵憲一生影響甚大，黃氏早歲中舉後決定放棄科場而出使，即受他影響。¹⁵ 人境廬詩與他有關的甚多，有十一題十六首，計為〈福州大水行同張樵野丈蔭桓龔鬻人丈易圖作〉(1876年作)、〈將應順天鄉試仍用前韻呈龔人樵野丈〉(1876年作)、〈述懷再呈龔人樵野丈〉(1876年作)、〈張樵野廉訪以直北苦旱嶺南乃潦詩見示次韻和之〉(1877年作)、〈歲暮懷人詩〉之「釋之廷尉由參乘」一首(1890年作)、〈馬關紀事〉之「既遣和戎使」(1895年作)、〈感懷呈樵野尚書丈即用話別圖靈字韻〉(1896年作)、〈放歌用前韻〉(1896年作)、〈題樵野丈運甓齋話別圖〉(1897年作)、〈感事〉其五(1898年作)、〈杜鵑〉(1900年作)

¹¹ 錢仲聯《夢苕庵詩話》云：「《人境廬詩草》以〈感懷〉詩起，詩中述洪楊平後，清室中興事。以〈李肅毅侯挽詩〉終，則以肅毅一身，繫晚清安危之局，肅毅亡而清運亦終矣。編詩之起訖如此，蓋隱以詩史自居。」(頁162)

¹² 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云：「聞公度以屬員見總督張之洞，亦復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見《人境廬詩草箋注》書前。

¹³ 參《黃公度先生傳稿》，頁56，604。

¹⁴ J. D. Schmidt, *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 of Huang Zunxian, 1848-19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

¹⁵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p. 24.

等。¹⁶ 這十多首詩的寫作年份，起自張黃二人煙臺初見之年，終於張氏死於戍所之年，中間更包容了張氏生平的幾個重要階段與事件，合而讀之，直是張氏一生小傳，於此也可見二人關係之密切。《人境廬詩草》記何如璋的詩有〈歸過日本誌感〉(1885年作)、¹⁷ 〈十月十九日至滬初隨何大臣使日本即於是日由上海東渡今十二年矣〉(1888年作)、¹⁸ 〈歲暮懷人詩〉之「三年秉節輝英蕩」(1890年作)、¹⁹ 〈己亥雜詩〉之「滔滔海水日趨東」(1899年作)²⁰ 等四首。何如璋有〈辛巳十一月五日大雪獨飲墨江樓步公度前游之韻得詩七首〉(1881年作)和黃遵憲，²¹ 又曾贈黃遵憲對聯。²² 何如璋駐日時致

- ¹⁶ 與張蔭桓有關各詩，其出處資料如下：〈福州大水行同張樵野丈蔭桓龔人丈易圖作〉，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70。時初識張蔭桓。龔易圖卸任登青萊道，張蔭桓接任，二人同在煙臺；〈將應順天鄉試仍用前韻呈龔人樵野丈〉，七律四首，見同書，頁173。有請求提拔之意；〈述懷再呈龔人樵野丈〉，五古三首，見同書，頁178；〈歲暮懷人詩〉「釋之廷尉由參乘」一首，黃自注云：「張樵野廷尉。」見同書，頁547；〈馬關紀事〉「既遣和戎使」一首，記1894年清廷派張蔭桓、邵友濂(?-1901)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為日本所拒事，見同書，頁676；〈感懷呈樵野尚書丈即用話別圖靈字韻〉，見同書，頁726；〈放歌用前韻〉，見同書，頁729；〈題樵野丈運甃齋話別圖〉，見同書，頁733；〈感事〉其五「鑿空虛槎疑漢使」句詠張蔭桓，見同書，頁787；〈杜鵑〉「久戍黃沙病馬嘶」句，錢仲聯謂「當指李端棻、張蔭桓」，見同書，頁877；〈張樵野廉訪以直北苦旱嶺南乃潦詩見示次韻和之〉，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41。
- ¹⁷ 〈歸過日本誌感〉「今日荷戈邊塞去，可堪雪窖復冰天」二句黃氏自注：「謂何子峨欽使。」何如璋1884年在福建船政大臣任內因臨戰出逃，致使福建水師覆滅，被革職遣戍。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399-400。
- ¹⁸ 〈十月十九日至滬初隨何大臣使日本即於是日由上海東渡今十二年矣〉「公正南歸吾北上，欲論近事恨無緣」句黃氏自注云：「子峨先生自塞外賜環，由滬來潮，余方由港往滬，故差池不得相見。」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445。何如璋於1888年遇赦回廣東，到潮州韓山書院主講席。黃遵憲則攜《日本國志》經上海赴京等待仕宦的機會。
- ¹⁹ 〈歲暮懷人詩〉「三年秉節輝英蕩」一首，黃氏自注：「何子峨宮詹。」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35。此詩是何如璋一生小影。
- ²⁰ 〈己亥雜詩〉「滔滔海水日趨東」一首，黃氏自注云：「在日本時，與子峨星使言，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要之必變。將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後，其言必驗。」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26。
- ²¹ 〈辛巳十一月五日大雪獨飲墨江樓步公度前游之韻得詩七首〉見《梅州文史》第六期(梅州：梅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年)，頁140。
- ²² 何如璋贈黃遵憲聯語云：「逸翮後塵，翺翥先路。植根芳苑，擢秀清流。」見《梅州文史》第六期圖片頁。以黃遵憲、何如璋在駐日公使館關係之密切，而二人又均能詩，黃遵憲在日本時應有不少贈何如璋的詩，可惜《人境廬詩草》及《人境廬集外詩輯》都不存錄。今可見者有〈步星使大人原韻〉七絕一首(1878年作)，載鄭子瑜、實藤惠秀(編)：《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頁76。

總署及李鴻章公文，多出黃遵憲之手。²³

李氏幕府中人，黃氏有交往且見於《人境廬詩草》的有范當世(1854-1904)、盛宣懷(1844-1916)、王修植(1860-1900)、徐壽朋(?-1901)、于式枚(1853-1915)、嚴復(1854-1921)等。范當世於1891年至1894年居李鴻章幕，多所獻言。黃遵憲1895年識之於南京，有〈為范肯堂當世題大橋遺照〉一首。²⁴ 范氏則曾為《人境廬詩草》題跋，²⁵ 又曾作〈旅中無聊流觀昔人詩至於千首有感於黃公度之人之詩而遽成兩律以相贈〉贈黃遵憲。²⁶ 盛宣懷自1870年起居李鴻章幕，歷時二十多年，是李幕中辦洋務的主力。²⁷ 黃氏的〈述聞〉其五和〈六用前韻〉其一都詠及盛宣懷與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在拳變時電劾禍首及倡議「東南互保」之事。²⁸ 王修植在李鴻章幕中甚受重用，李曾委託他辦理北洋水師學堂。黃遵憲於1896年識之於天津，〈己亥續懷人詩〉「自家法自家妝」一首(1899年作)即懷王修植。徐壽朋曾隨李鴻章之幕僚鄭藻如(1827-1894)出使美國，歸國後入李鴻章幕，襄助外交事務，曾佐李鴻章簽訂《辛丑和約》。黃遵憲1881年與他在日本見面時有詩贈他，題為〈徐晉齋觀察吳翰濤貳尹隨使美洲道出日本余飲之金壽樓翰濤即席有詩和韻以贈〉。²⁹ 于式枚在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居其幕十餘年，時李幕奏牘多出其手。黃遵憲1889年居北京時與他相識，〈歲暮懷人詩〉「天邊雄鎮北門管」一首(1890年作)即懷于式枚。³⁰ 嚴復是李鴻章系的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黃氏1896年在天津與他相識，〈己亥續懷人詩〉「一卷生花天演論」(1899年作)寫的就是他。³¹

至於丁汝昌(1836-1895)與袁世凱(1859-1916)這兩位曾參贊李鴻章戎幕的人物，雖曾出現於《人境廬詩草》，黃遵憲卻是以譴責的筆調寫他們的。丁汝昌出身太平軍，歸順後編入淮軍，在李鴻章手下是海軍將才。1893年率艦巡航全球，當時黃遵憲任清廷駐新加坡總領事，特別要求艦隊在新加坡停留。1894年艦隊抵新加坡，

²³ 參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頁21。

²⁴ 詩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72。大橋是范妻姚蘊素，系出名門，為姚瑩(1785-1853)女孫、姚永概(1866-1923)之姊。范當世嘗遍請當時名士為其亡妻題照。

²⁵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084。1895年作。

²⁶ 《范伯子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頁276-77。1895年作。

²⁷ 參Kenneth E. 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38。

²⁸ 〈述聞〉其五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92；〈六用前韻〉其一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964。

²⁹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59，321。

³⁰ 〈歲暮懷人詩〉「天邊雄鎮北門管」一首，黃氏自注：「于晦若侍郎。」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47。

³¹ 此詩黃氏自注：「福州嚴又陵。」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56。

黃遵憲率華民盛大歡迎。丁汝昌同年在黃海海戰中孤軍無援，疑為部下脅迫投降，以保存士卒性命，日軍受降後他在劉公島仰藥自盡。黃遵憲並不原諒他投降的行為，在〈降將軍歌〉、〈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題黃佐廷贈尉遺像〉其三這三首寫於1895年的詩中大施撻伐。³² 袁世凱也出身淮軍，1894年曾居李氏幕府。³³ 由於他在戊戌政變中的所為對維新派有毀滅性的影響，黃遵憲在〈感事〉其二中直斥袁氏首鼠兩端。³⁴ 雖然如此，袁氏對黃遵憲的才華仍很賞識，1901年他任直隸總督時仍曾舉薦黃氏。³⁵

黃氏認識但在《人境廬詩草》中不曾提及的李氏幕客，有陳季同(1851-1907)、丁日昌(1823-1882)、郭嵩燾(1818-1891)、劉瑞芬(1827-1892)、伍廷芳(1842-1922)、薛福成(1838-1894)、鄭觀應(1842-1922)、鄭藻如(1827-1894)、李興銳(1827-1904)³⁶ 等人。從上述名單可見黃遵憲與李鴻章幕府關係之密切深厚，而在他所認識的李氏幕僚中，逾半曾在《人境廬詩草》中出現，也說明了詩歌是他維繫與李氏幕府關係的重要工具。

三

相對於李鴻章幕府，黃遵憲與張之洞幕府的關係開展得較晚，但卻更直接更深入。黃遵憲初識李鴻章在1876年，其時他還未展開事業；黃遵憲初識張之洞卻在十年之後，其時他已出使過日本與美國。初見李鴻章，他連舉人的功名都未到手，遑論具體的政績。雖然李鴻章許他為「霸才」，他仍然無法打入李幕得一幕賓之席。但初見張之洞，他已因出使日本和美國的表現建立了使才、幹才之名，因此張之洞刻意要羅致他，儘管他「昂首加膝，搖頭而大語」的傲氣，可能頗令南皮不悅。³⁷

³² 三詩俱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降將軍歌〉寫丁汝昌黃海戰敗投降自殺事。從詩題看他顯然是譴責丁汝昌投降，但又對丁氏降而復死疑不能明(頁682)。〈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中「曹蜍李志奄奄氣，仰求敵國垂哀憐。言為眾生乞生命，手書降表黃龍箋」諸句，刺丁汝昌投降(頁664)。〈題黃佐廷贈尉遺像〉其三中「一語衝君冠上髮，有人降表寫龍箋」二句，亦刺丁汝昌投降事(頁715)。

³³ 參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p. 150。

³⁴ 〈感事〉其二：「上變飛騰赤白囊，兩端首鼠疾奔忙。剛聞赤板連名奏，便召長檜第六郎。」記袁世凱首鼠兩端、密告榮祿事；其七「如何此事竟推袁」句，亦議及袁氏。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81，789。

³⁵ 黃遵憲〈致梁詩五書〉云：「報中有肅王袁督推薦之語，然某以為出處聽之天，非人力所能推挽也。」見鄭海麟、張偉雄(編)：《黃遵憲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頁186。

³⁶ 參馬昌華：《淮系人物列傳》(合肥：黃山出版社，1995年)。

³⁷ 參注11。康氏所述應是指1895年的見面而言。

黃遵憲從張之洞手中得到的第一份差使是巡察南洋諸島，時維1886年。但黃遵憲一心要盡快完成《日本國志》，便婉拒了。³⁸ 黃氏認定《日本國志》是他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的重要工具，比接受張之洞手上一份巡察南洋的差事重要得多。事實也證明《日本國志》對他後來的仕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經歷十年辛苦的《日本國志》終於在1887年完成，黃遵憲把十二卷五十萬字的稿本鈔寫四份，一份送張之洞，一份送李鴻章，一份送總理衙門，一份自存。³⁹ 這三份稿本的收受者，並不是黃氏實現政治理想的最終目標，他的目標是在這三者上面的光緒帝。他用心建立與這三者的關係網，目的其實很清楚。

在送《日本國志》給張之洞的時候，黃遵憲還請張之洞為《日本國志》寫了咨文；他後來把張之洞的咨文和李鴻章的批文刊在廣州富文齋1895年初版的《日本國志》書前。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其時張之洞初署兩江總督，黃遵憲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張之洞奏調黃遵憲回國，使任職於張在江寧的幕府，但又置之閑散，黃遵憲頗表不滿。黃氏後來辦《時務報》，又與代表張之洞的汪康年(1860-1911)生齟齬。1902年黃氏退居嘉應期間，兩廣總督陶模(1853-1902)擬請黃遵憲主講廣雅書院(是年改為高等學堂)，張之洞力沮之。總結黃張二人十餘年的關係，張之洞無疑很賞識黃遵憲的才華，但因政見不同，張之洞對他頗有顧忌，是以不能重用。在黃遵憲而言，他冀望的功業尚在張之洞之上，當然不易受張氏羈靡，而對張氏出於顧忌而不肯委以重任，其怨懟也溢於言表。

《人境廬詩草》中寫及張之洞的詩主要集中在〈己亥雜詩〉。〈己亥雜詩〉作於1899年，也就是黃氏放歸的翌年，是他仿效龔自珍(1792-1841)總結一己平生志事的組詩，⁴⁰ 有詩八十九首，其中與張之洞有關的有三首，可見張之洞在黃氏一生事業中的重要性。其中「御屏丹筆記名新」一首自注提到「數年來以人才保薦，疆臣則……香濤督部三次」，張之洞是保薦黃遵憲次數最多的疆臣，黃自有知遇之感。三首中最值得留意的是以下這一首：「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茫茫人海浮沉處，添得閒鷗又二三。」黃氏自注云：「香濤制府署兩江總督，於受事日，即電奏調余回華。同時奏調者二三人，然有賦閒者。」⁴¹ 這很清楚表達了對張氏在1894年奏調他回國但

³⁸ 黃氏〈日本國志·敘〉說：「乙酉〔1885〕之秋，由美回華，星使鄭公既解任，繼之者張公，仍促余往。而兩廣制府張公，又命遵憲為巡察南洋諸島之行，遵憲念是書棄置可惜，均謝不往。」見《日本國志》(廣州：富文齋，1890年)，頁3下。

³⁹ 見吳天任：《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3。

⁴⁰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云：「龔定庵有〈己亥雜詩〉三百六十首，言近世文學者喜誦之。近頃見人境廬主人亦有〈己亥雜詩〉數十首，蓋主人一生歷史之小影也。」(頁101)

⁴¹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37，835。

又不予重用的不滿。⁴²「黃鶴高樓又搥碎」一首，也諷刺張氏用人不當、洋務失敗，借以宣洩一己不獲重用之鬱結。詩云：「黃鶴高樓又搥碎，我來無壁可題詩。擎天鐵柱終虛語，空累尚書兩鬢絲。」黃氏自注云：「黃鶴樓已毀，南皮制府常語賓僚，將來鍊鐵有效，當改造鐵壁，庶免火災。然鐵政一局，費餉五六百萬，已易官為商矣。」⁴³其嘲諷是既深刻又顯豁的。

除了這三首詩，《人境廬詩草》提及張之洞的還有〈述聞〉其五、〈五用前韻〉其二、〈六用前韻〉其一，都涉及張氏在庚子事變中的舉措。⁴⁴

黃遵憲由於曾居張氏幕府，與張氏幕客稔熟，《人境廬詩草》中寫到的張氏幕客有十多人，計為陳慶年(1862-1929)、黃紹箕(1854-1907)、柯逢時(1844-1912)、梁鼎芬(1859-1919)、沈瑜慶(1858-1918)、王秉恩(1845-1928)、王樹枏(1852-1936)、楊銳(1857-1898)、沈曾植(1850-1922)、楊深秀(1849-1898)、楊守敬(1839-1915)、葉大莊(?-1898)、易順鼎(1858-1920)、鄭孝胥(1859-1938)等。其中楊守敬、黃紹箕、沈曾植和梁鼎芬是黃氏在入張氏幕前就認識的。楊守敬與黃遵憲是駐日公使館同事，楊氏後來曾入張之洞幕，1899年至1901年主兩湖書院及勤政、存古學堂講席。黃氏《日本雜事詩》「鐵壁能逃劫火燒」一首曾提及他。⁴⁵黃紹箕一生服膺張氏之學，又娶張氏姪女為妻。曾列名上海強學會籍，又參與議定學會章程。黃遵憲1889年識之於上海，〈歲暮懷人詩〉「娓娓清談玉屑霏」一首(1890年作)所懷的就是他。⁴⁶沈曾植為強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有「正董」、「總董」之名。曾居張氏幕，1898年至1900年主講兩湖書院。黃遵憲1889年識之於北京。黃氏贈沈氏詩有〈歲

⁴² 陳崢〈從張之洞與黃遵憲關係看他的用人思想〉一文則對張之洞召回黃遵憲後「置之閑散」之說提出質疑，見河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43-44。陳氏認為此詩中的「賦閑者」可能是指朱采(1833-1901)而非指黃遵憲。然而從黃氏〈己亥雜詩〉帶有濃厚自敘傳味道的特性來看，陳氏的質疑應難成立。另據陳衍(1856-1937)《石遺室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卷八云：「甲午中日之役，君〔黃遵憲〕方為新嘉坡總領事，張廣雅督部由湖廣移督兩江，以籌防需人，檄調回，又置之閑散。公度甚不樂。」(頁12)陳衍於1895年識黃遵憲於上海，詩酒之會頗密，對當時黃遵憲的心情應有直接的體會。

⁴³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36，837。

⁴⁴ 〈述聞〉其五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92；〈五用前韻〉其二見同書，頁963，〈六用前韻〉其一見同書，頁964。

⁴⁵ 《日本雜事詩》「鐵壁能逃劫火燒」一首自注：「佛寺多以石室鐵壁藏經，秘笈珍本，亦賴之以存。變法之初，唾棄漢學，以為無用，爭出以易貨，連檣捆載，販之羊城。余到東京時，既稍加珍重，然唐鈔宋刻，時復邂逅相遇。及楊惺吾廣文來，余語以此事，並屬其廣為搜輯，黎莼齋星使因有《古逸叢書》之舉。」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123-24。

⁴⁶ 〈歲暮懷人詩〉「娓娓清談玉屑霏」一首，黃氏自注云：「黃仲韜編修。」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56。

暮懷人詩》之「懷仁久熟坤輿志」(1890年作)、〈和沈子培同年〉(1897年作)、〈游仙詞仍用沈乙庵韻〉(1897年作)三首。⁴⁷ 梁鼎芬是張之洞的親信，自1887年起即居張氏幕，1895年參與發起上海強學會，隱然是張之洞的代表，對維新派的工作多所掣肘。黃遵憲在湖南推行新政時，梁鼎芬亦力沮之。黃遵憲在1889年以前就與他認識，黃氏詩中與他有關的甚多，如〈歲暮懷人詩〉之「聞君近入焦山去」一首(1890年作)、⁴⁸ 〈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柯巽庵梁節庵王晉卿諸君小飲和節庵韻〉(1895年作)、⁴⁹ 〈寒食日游莫愁湖〉(1895年作)、⁵⁰ 〈以桃蘭二花贈節菴承惠詩索和依韻奉答〉(1895年作)⁵¹ 等各首均是，可見他是黃氏用力爭取、視為溝通與張之洞關係的人物。至於黃氏〈己亥雜詩〉中的「憐君膽小累君驚」一首，則記戊戌政變後梁鼎芬主動與黃遵憲絕交事，也標誌了黃氏與張氏幕關係的變動。⁵²

《人境廬詩草》中提到的張氏幕僚，不少是他在1894年至1895年兩年間居張氏幕時認識的，如柯逢時、沈瑜慶、王秉恩、王樹枏、葉大莊等都是。人境廬詩中的〈寒食日游莫愁湖〉(1895年作)、〈玄武湖歌和龍松岑〉(1895年作)、〈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柯巽庵梁節庵王晉卿諸君小飲和節庵韻〉(1895年作)諸詩便是記與他們的詩酒之會。⁵³ 諸人中黃遵憲與葉大莊詩文關係較密切，人境廬詩中有〈偕葉損軒夜談〉(1895年作)、〈用寫經齋體送葉損軒之申江〉(1895年作)、〈損軒同年權上海同知賦詩見示

⁴⁷ 〈歲暮懷人詩〉「懷仁久熟坤輿志」一首，黃氏自注云：「沈子培戶部。」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45；〈和沈子培同年〉見同書，頁747；〈游仙詞仍用沈乙庵韻〉見同書，頁748。

⁴⁸ 〈歲暮懷人詩〉「聞君近入焦山去」一首，黃氏自注云：「梁星海太守。」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55-56。

⁴⁹ 〈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柯巽庵梁節庵王晉卿諸君小飲和節庵韻〉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11。

⁵⁰ 〈寒食日游莫愁湖〉「先生束卷置高閣」句黃氏自注：「節庵鍾山院長。」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72。

⁵¹ 〈以桃蘭二花贈節菴承惠詩索和依韻奉答〉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73。

⁵² 〈己亥雜詩〉「憐君膽小累君驚，抄蔓何曾到友生。終識絕交非惡意，為曾代押黨碑名」一首，黃氏自注云：「八月二十五日得一紙，曰□與□絕交。然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為往金陵謁南皮制府，欲開強學會，□力為周旋。是時余未識康，會中十六人有余名，即□所代簽也。又聞□與康至交，所贈詩有南陽臥龍之語。及康罪發，乃取文梯參劾之摺，彙刊布市，蓋亦出於無奈也。」古直箋認為「空白中人，或云梁鼎芬也」。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42-43。

⁵³ 〈寒食日游莫愁湖〉「夾抱文書雁行立」句黃氏自注：「損軒〔葉大莊〕司制文案。」「官催軍糧鷓呼急」句黃氏自注：「藹倉〔沈瑜慶〕主籌邊防局。」俱言及二人在張幕的職司，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72。〈玄武湖歌和龍松岑〉「承平公子文章伯」句黃氏自注：「同坐有沈藹蒼〔沈瑜慶〕、王雪澄〔王秉恩〕兩觀察。」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07-8。〈九月初三

依韻奉和) (1895年作) 三詩是贈葉大莊的。⁵⁴ 葉大莊1894年入張之洞幕，主洋務文案。

這兩年間黃遵憲認識的張幕中人還有鄭孝胥與易順鼎。鄭孝胥與黃遵憲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二人俱為舉人出身，俱以詩名家，俱與李鴻章、張之洞二幕關係密切，俱曾使日，俱曾參與維新運動。二人俱有才具，鄭孝胥後來在遜帝小朝廷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又在偽滿洲國任國務總理大臣；黃遵憲在光緒帝載湉原來的籌算中最終是要調回朝中主持軍機的，可惜因政變而罷。⁵⁵ 鄭孝胥於1885年曾居李鴻章幕，其後於1894年至1896年及1898年至1902年兩度居張之洞幕。黃遵憲居張之洞幕府任江寧洋務局總辦時，鄭孝胥曾在他手下辦事。黃氏頗重鄭氏之才，〈己亥續懷人詩〉「閃電雙眸略似瞋」一首(1899年作)即懷鄭孝胥。⁵⁶ 鄭氏日記中記載與黃遵憲在江寧洋務局共事之事甚詳，對黃氏之為人、處事與詩作則頗有微詞。⁵⁷ 易順鼎居張之洞幕時主講兩湖書院，與黃遵憲酬唱頗密，黃氏詩與他有關的有〈立秋訪易實甫遂偕遊秦淮和實甫作〉(1895年作)、〈又和實甫〉(1895年作)、〈乙未秋偕實甫同泛秦淮實甫出魂南北集囑題成此〉(1895年作)、〈再題實甫魂南集〉(1895年作)、〈己亥續懷人詩〉之「少年罪狀在金荃」(1899年作)等多首。⁵⁸

至於陳慶年，1897年至1903年居張幕，管兩湖學務及譯書局，黃氏〈己亥續懷人詩〉之「四壁青山亂疊書」一首(1899年作)所詠的就是他。⁵⁹ 「戊戌六君子」中的楊銳、

〔上接頁414〕

夜招袁重黎柯巽庵梁節庵王晉卿諸君小飲和節庵韻詩，柯巽庵即柯逢時，王晉卿即王樹枏。見同書，頁711。

- ⁵⁴ 〈偕葉損軒夜談〉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60；〈用寫經齋體送葉損軒之申江〉，見同書，頁704；〈損軒同年權上海同知賦詩見示依韻奉和〉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71。
- ⁵⁵ 據正先〈黃公度——戊戌維新的領袖〉(《逸經》10期〔1936年〕)，光緒帝有意以黃遵憲總領軍機，但由於黃氏官位低微，故先命他為出使日本大臣，預期半年後調他回朝。正先為黃遵憲之孫黃延續筆名。
- ⁵⁶ 〈己亥續懷人詩〉「閃電雙眸略似瞋」一首，黃氏自注云：「福州鄭孝胥。」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59。
- ⁵⁷ 《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462，468，471，474，481，499，507，542，545，610，611俱言及黃遵憲。
- ⁵⁸ 〈立秋訪易實甫遂偕遊秦淮和實甫作〉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05；〈又和實甫〉見同書，頁706；〈己亥續懷人詩〉「少年罪狀在金荃」一首，黃氏自注云：「龍陽易實甫。」見同書，頁861。〈乙未秋偕實甫同泛秦淮實甫出魂南北集囑題成此〉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57；〈再題實甫魂南集〉見同書，頁71。
- ⁵⁹ 〈己亥續懷人詩〉「四壁青山亂疊書」一首，黃氏自注：「丹徒陳善餘。」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62。

楊深秀，與張幕俱有關。楊深秀曾由張之洞委為會德堂書院院長，楊銳則更是張之洞在京的耳目。黃氏在〈感事〉(1898年作)詩中詠及他們。⁶⁰

黃氏認識但在人境廬詩中不曾提及的張氏幕客，有蔡錫勇(1847-1897)、陳衍(1856-1937)、郭家驥(1870-1931)、蒯光典(1857-1910)、錢恂(1853-1927)、汪康年、許珏(1843-1916)、章炳麟(1869-1936)、張通典(1861-1915)、鄒代鈞(1854-1908)等人。相比於李鴻章的幕府，張之洞的幕府無疑更有學術、文學氣息，幕客中也不乏這方面的才傑之士。⁶¹黃遵憲身處其中，顯然頗為相得，因此黃遵憲與張幕中人的往來，也明顯比與李幕中人頻密。但在張幕得不到重用，卻是他耿耿於懷的事。張幕於他顯非可以久留之地了。

四

黃遵憲在為建立與李鴻章及張之洞這兩位封疆大吏的關係而編織網絡的同時，他也在編織連結到中央朝廷的網絡。由於他初出道就揀選了外交官這條路，而從1876到1895這二十年間，他的事業也以外交為主，他結網的重點也就放在總理衙門。黃氏旨在介紹日本維新實況的《日本雜事詩》最初就是交由總署在1879年出版的。黃氏深具影響力的《日本國志》，1887年寫成時，鈔成四份，其中一份送到總署。⁶²但顯而易見的是，他的最終目標並非總署，而是總署上面的皇帝。他這方面的織網過程，在人境廬詩中有很具體的反映，而人境廬詩其實就是他織網的工具。

從人境廬詩中所見，黃遵憲與總理衙門關係異常密切。詩中提及的總署大臣有寶鑒(1807-1891)、鄧承修(?-1891)、許景澄(1845-1900)、袁昶(1846-1900)、張蔭桓、汪鳴鑾(1839-1907)、李鴻章、陳蘭彬等。這數人中黃遵憲認識最早的是鄧承修、張蔭桓與李鴻章。鄧承修是黃父黃鴻藻的朋友，黃遵憲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居北京時認識他。鄧氏於1884至1885年派在總署行走。他頗賞識黃遵憲，許為「國器」，⁶³1884年任總理衙門大臣時又保奏黃遵憲為「使才」。⁶⁴人境廬詩提及鄧承修

⁶⁰ 〈感事〉其四「金甌親卜比公卿」一首，詠戊戌六君子，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85；其六「心肝誰奉藏衣詔」句，記楊銳奉衣帶詔事，見同書，頁788。

⁶¹ 參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161-63。

⁶² 參注6。

⁶³ 〈三哀詩·袁爽秋京卿〉云：「追述潘鄧說，許我以國器。」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000。

⁶⁴ 〈己亥雜詩〉「御屏丹筆記名新」一首自注云：「數年來以人才保薦，……鄧鐵香鴻臚於光緒九年(1883)保奏使才，已有久困下僚之語。」按鄧承修保薦黃氏之年份，錢仲聯《黃公度先生年譜》作光緒十年(1884)，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192。

的有〈歲暮懷人詩〉之「既死奸諛膽尚驚」(1890年作)、⁶⁵〈己亥雜詩〉之「御屏丹筆記名新」、⁶⁶〈三哀詩〉⁶⁷等諸首。張蔭桓1884年及1890至1898年兩度入值總理衙門，又曾參與新政，與帝師翁同龢(1830-1904)相熟，被視為「帝黨」。李鴻章自1896年至1898年任總署大臣。黃氏與他們的關係在上文已有詳細介紹，此處不贅。

袁昶與黃遵憲的關係也非比尋常。袁氏向任總署章京，1898年至1900年任總署大臣，熟悉外交事務。黃遵憲1889年識之於北京。他曾推薦黃遵憲任駐英使館參贊，對黃氏的《日本國志》評價極高，⁶⁸而在戊戌政變發作後，他又在朝中力保黃氏。人境廬詩中提及他的有好幾首，如〈歲暮懷人詩〉之「自笑壺丘懾鄭巫」(1890年作)、〈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柯巽庵梁節庵王晉卿諸君小飲和節庵韻〉(1895年作)、〈再述〉其三(1900年作)、〈諭勦義和團感賦〉(1900年作)、〈三哀詩·袁爽秋京卿〉(1901年作)、〈京亂補述六首〉其五(1901年作)等都是。⁶⁹袁昶亦能詩，為晚清浙派詩代表人物，其集中贈黃遵憲詩不少，多見於《于湖小集》。至於許景澄，與袁昶同於1898年至1900年在總署行走，同於拳亂時為朝旨所殺。黃遵憲於1889年識之於北京，黃氏提及他的詩，除了上述亦與袁昶有關的涉及拳變的幾首詩，尚有〈歲暮懷人詩〉之「骨肉凋零感慨多」一首(1890年作)。⁷⁰

寶鋆自1862年至1884年任總署大臣二十多年，是恭親王奕訢(1833-1898)的得力助手。人境廬詩中有〈上寶佩珩鋆相國〉(1889年作)一首。⁷¹汪鳴鑾與翁同龢相善，為帝黨成員，1894年至1895年任總署大臣。1886年任廣東學政時曾訪黃遵憲於

⁶⁵ 〈歲暮懷人詩〉「既死奸諛膽尚驚」一首，黃氏自注云：「鄧鐵香鴻臚。」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37。

⁶⁶ 見注60。

⁶⁷ 見注59。

⁶⁸ 黃氏〈三哀詩·袁爽秋京卿〉云：「公言行篋中，攜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此憶1895年二人見面時事，日本志即黃氏《日本國志》。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000。

⁶⁹ 有關袁昶各詩，其出處資料如下：〈歲暮懷人詩〉「自笑壺丘懾鄭巫」一首(1890年作)，黃氏自注：「袁爽秋戶部。」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40；〈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柯巽庵梁節庵王晉卿諸君小飲和節庵韻〉(1895年作)，見同書，頁711；〈再述〉其三(1900年作)「賓館鴻臚竟首懸」句，謂殺許景澄、袁昶等大臣。時袁昶在總理衙門上行走，見同書，頁936；〈諭勦義和團感賦〉(1900年作)「伏劍直臣猶未瞑，料應喜見中興時」二句，指袁昶、許景澄，見同書，頁945；〈三哀詩·袁爽秋京卿〉(1901年作)，見同書，頁993；〈京亂補述六首〉其五(1901年作)，見同書，頁989。

⁷⁰ 〈歲暮懷人詩〉「骨肉凋零感慨多」一首，黃氏自注云：「許竹簣星使。」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58。

⁷¹ 〈上寶佩珩鋆相國〉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56。

人境廬。人境廬詩中〈歲暮懷人詩〉之「一疏尊崇到許君」一首(1890年作)就是懷念他的。⁷²

黃遵憲認識但人境廬詩中未曾詠及的總署大臣尚有崇厚(1826-1893)、丁日昌、郭嵩燾、翁同龢等人。

人境廬詩中也提及不少總署章京，如何藻翔(1865-1930)、李岳瑞(1852-1927)、沈曾植、楊宜治、張元濟(1867-1959)、鄭孝胥等。黃氏1896年在京因梁啟超(1873-1929)之介識何藻翔，同年得出使英國大臣與出使德國大臣之命時均曾約何氏同行，但均未成事。人境廬詩中提及他的有〈為何翮高兵部題象山圖〉(1897年作)及〈己亥續懷人詩〉之「相約乘槎萬里遙」(1899年作)二首。⁷³黃氏1897年識李岳瑞。李氏對維新變法頗熱心，常以總署情報洩於與維新派多所往來、互通聲氣的國聞報館，又代推銷維新派的喉舌報《時務報》。人境廬詩〈己亥續懷人詩〉「優孟衣冠笑沐猴」一首(1899年作)即懷念他。⁷⁴黃氏1889年在京識楊宜治，〈歲暮懷人詩〉「典屬從公欲請纓」一首(1890年作)是為他而寫的。⁷⁵黃氏1896年在京識張元濟。張以徐致靖(1842-1918)之薦見用於光緒帝，光緒帝要讀的新書，包括黃氏的《日本國志》，都由他送進宮。⁷⁶人境廬詩中〈己亥續懷人詩〉之「金華講殿共論思」一首(1899年作)說的就是他。⁷⁷沈曾植、鄭孝胥二人前文已介紹過，此處不贅。

五

黃遵憲憑一己的才能，在他擔任的各個職位上都幹出了成績，他也以《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確立了「日本通」的令名，又借詩歌作為友朋間互相推轂的工具，使他

⁷² 〈歲暮懷人詩〉「一疏尊崇到許君」一首，黃氏自注：「汪柳門侍郎。」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48。

⁷³ 〈為何翮高兵部題象山圖〉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59；〈己亥續懷人詩〉「相約乘槎萬里遙」一首，黃氏自注：「順德何翮高。」寫約何藻翔隨使英、德而未能成行事，見同書，頁863。

⁷⁴ 〈己亥續懷人詩〉「優孟衣冠笑沐猴」一首，黃氏自注：「咸陽李孟符。」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51。

⁷⁵ 〈歲暮懷人詩〉「典屬從公欲請纓」一首，黃氏自注：「楊虞裳刑部。」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45。

⁷⁶ 張元濟〈戊戌政變的回憶〉：「那時候黃遵憲做了一部《日本國志》，光緒指名要這部書看，也是由我取來送進去的。」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四冊，頁324。

⁷⁷ 〈己亥續懷人詩〉「金華講殿共論思」一首，黃氏自注：「海鹽張菊生。」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50。

的名聲通於帝座。經過二十年辛苦經營，黃遵憲終於在1896年打進了政治的權力核心。是年九月，黃遵憲奉旨入京，先後見了光緒帝和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這次召見，是經由總理衙門徵召的。由於他官位低微，要由吏部帶領引見，但受到吏部阻攔，結果要由光緒帝破格親自召見。黃遵憲視此為殊寵、「異數」，《人境廬詩草》於此有很詳細的記載，〈己亥雜詩〉有兩首是記這次陛見的：「丹樓彩日畫中看，初上鸞坡舉步艱。勞動九重前席問，繡衣門外立天官。」黃氏自注云：「故事道府以下官，必先行引見，乃得召見。余因總理衙門徵召至京，本有由吏部帶領引見之旨，而部議尼之，乃奉特旨預備召見，蓋異數也。」「丹樓」兩句，固是入朝實況，也表達了黃氏經歷二十年辛苦經營，終於能夠實現理想面見皇帝的喜悅與感慨。第二首云：「堯天到此日方中，萬國強由變法通。驚喜天顏微一笑，百年前亦與華同。」黃氏自注云：「召見時，上言泰西政治，何以勝中國？臣奏：泰西之強，悉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上初甚驚訝，旋笑領之。」⁷⁸ 光緒帝召見他，是因為視他為通曉外國政情的專家，這正是他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所建立的專家地位，以及由編織關係網絡而形成的名聲效應而得來的。

見過光緒帝之後，黃遵憲也見了翁同龢。人境廬詩中沒有提過翁同龢，但黃遵憲在見翁同龢之前，早就結識了翁氏身邊一批被視為帝黨的人物，如陳燾(1855-1900)、沈瑜慶、汪鳴鑾、文廷式(1856-1904)、張蔭桓等。文廷式曾為長善幕賓，與志銳(1852-1912)、志鈞(1854-1900)均友善，是珍妃(1876-1900)、瑾妃(1874-1924)入宮前的老師，與翁同龢交往甚深。黃遵憲於1889年識之於北京。甲午中日戰爭時文廷式是主戰派，黃遵憲曾說，如果《日本國志》早出，文廷式當時便不會主戰了。人境廬詩中提及他的有〈歲暮懷人詩〉之「島夷史讀吾妻鏡」(1890年作)、〈閏月飲集鍾山送文芸閣學士歸兼懷陳伯嚴吏部〉(1895年作)二首，另有詞〈賀新郎·乙未五月芸閣南歸飲集吳船各撫賀新郎詞以志悲懼〉(1895年作)一首。⁷⁹ 陳燾也是很受翁同龢賞識的人，他與黃遵憲於1889年在北京相識。黃氏〈歲暮懷人詩〉之「天竺新茶日本絲」一首(1890年作)所懷者就是他。⁸⁰ 其餘沈瑜慶、汪鳴鑾、張蔭桓諸人，上文都介紹過。沈瑜慶是翁同龢的門生，汪、張二人與翁同龢關係亦非比尋常。

⁷⁸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38-39。

⁷⁹ 〈歲暮懷人詩〉「島夷史讀吾妻鏡」一首，黃氏自注：「文芸閣編修。」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40；〈閏月飲集鍾山送文芸閣學士歸兼懷陳伯嚴吏部〉見同書，頁703；〈賀新郎·乙未五月芸閣南歸飲集吳船各撫賀新郎詞以志悲懼〉見《人境廬集外詩輯》，頁66。文廷式贈黃遵憲詩詞則有〈賀新郎·贈黃公度觀察〉(1895年作)及〈贈黃公度參贊〉(1895年作)，見《文廷式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416及1342-43。

⁸⁰ 〈歲暮懷人詩〉「天竺新茶日本絲」一首，黃氏自注：「陳次亮戶部。」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43。

翁同龢與黃遵憲的交往，在翁氏的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載。《翁同龢日記》從1896年九月廿一日(10月27日)到1897年六月十五日(7月14日)提及黃遵憲共十三次，其中見面者四次，每次均為「劇談」、「長談」、「詳談」，可見二人十分相得。翁同龢也很重視黃遵憲，讀了他的《日本國志》，並以相國之尊，親自往訪黃氏。1896年十月，總署先後授黃氏為出使英國大臣及出使德國大臣，因英法兩國反對，最後都不成事，翁氏日記對這兩件事的始末都有詳細記載。到了1897年五月，終由翁氏薦黃遵憲為湖南長寶鹽法道。⁸¹

黃遵憲在湖南一年，結合同道，試驗新政。但朝廷裏的光緒帝並沒有忘記他。光緒帝在1898年初向翁同龢索讀《日本國志》，⁸²同年六月特簡黃遵憲為出使日本大臣。〈己亥雜詩〉於此也有詳細記載：「三詔嚴催倍道馳，霸朝一集感恩知。病中泣讀維新詔，深恨鋒車就召遲。」黃氏自注云：「戊戌二月，上命樞臣進《日本國志》，繼再索一部。奉使日本，由上特簡，三詔敦促，有無論行抵何處，著張之洞、陳寶箴傳令攢程迅速來京之諭。然余以久病，恨未能遽就道也。」⁸³戊戌六月，維新正處於如火如荼的階段，光緒帝在這時任命黃遵憲出使日本，其後又三詔敦促他進京，是很不尋常的舉措。因此有人推測當時光緒帝急召黃氏入京的意圖是要他總領軍機，統籌新政。⁸⁴黃遵憲七月初八(8月24日)離長沙，沿途因病滯留，至三十日(9月10日)始抵上海，又以病滯留。及政變發作，放歸故里，自此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黃遵憲用了二十年時間，精心籌劃、細心編織他的政治和仕宦網絡，逐步得到當時兩個超級幕府的幕主以至皇帝的賞識，終於來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位面前。雖然由於大氣候的轉變，他終於功虧一簣，但他建立仕宦網絡的工作卻是很成功的。從人境廬詩所見，他的仕宦網絡是周延而有效的。他成功固然是由於他的才識，而他巧妙運用傳統士人所重視的詩歌與著述，形成很具宣傳效力的關係網，終於使他以舉人之身，在二十年內從嘉應窮鄉走到皇帝面前。這個建立仕宦網絡的工程，人境廬詩中有具體的反映，而這也正清楚展示了晚清時期詩歌與政治的密切關係。

⁸¹ 《翁同龢日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1896至1897兩年間言及黃遵憲者見頁2051，2055，2056，2058，2060，2061，2073，2074，2093，2095，2096，2098各頁，其中2051，2074，2096，2098各頁提及與黃氏長談。

⁸² 《翁同龢日記》光緒廿四年正月廿三日(1898年2月13日)：「上向臣索黃遵憲《日本國志》，臣對未洽，頗致詰難。」(頁2152)光緒廿四年正月廿四日(1898年2月14日)：「是日以日本志兩部進呈。」(頁2152)。

⁸³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39。

⁸⁴ 參《黃遵憲與近代中國》，頁425-26。



Huang Zunxian's Poems and His Network in the Officialdom

(A Summary)

Chiang Ying-ho

Huang Zunxian's poems, usually known as *Renjinglu shi*, are well known for their political savour. They reveal in detail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his network in the officialdom. By writing poems to his friends in the political circles, Huang gave full play to his poetical talent in the building of the network by which he finally fell in the throne's good graces and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materialize his political ideal. Although the coup in 1898 ruined all his efforts and threw him back to his hometown as a commoner, his success in building an effective social network as shown in his poems proved that he was a poetical and political genius. This article aims at analyzing how Huang established the network to benefit his political career with his poetical talent.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is network can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his poems. By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